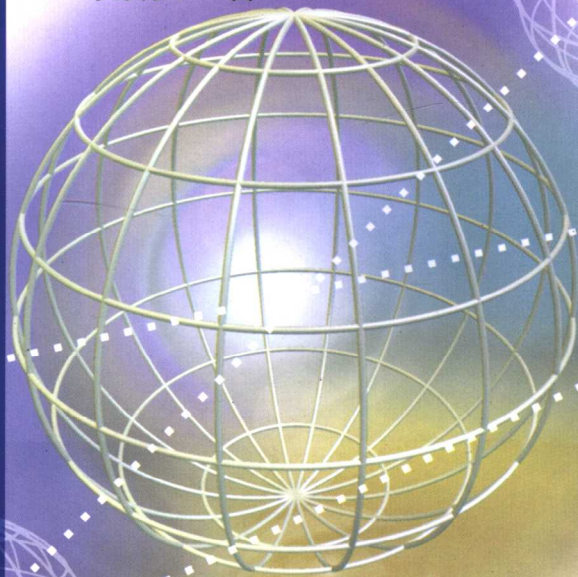


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现当代 国际关系史

(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

时殷弘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现当代 国际关系史

(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

时殷弘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 / 时殷弘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1 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ISBN 7-300-07373-5

I. 现…

II. 时…

III. 国际关系史-16 世纪~20 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8133 号

21 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

时殷弘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4.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6 000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此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总的来讲是好的,但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同时,也存在边界、领海、国际能源供应、区域和次区域冲突等其他不安全因素的困扰。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正在大步走向世界。这无疑为全球的繁荣带来生机和活力,但也引起种种疑虑和阻力。中国如何避免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探索出一条和平安全的、既造福于中国又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崛起之路?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现象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并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带动了相关人才的需求。

与之相适应,高校的国际政治学学科迅速发展,迄今为止仅建立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政治系的高校就达到四五十所。很明显,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对我国周边地区和整个国际形势做出冷静分析、准确判断、正确预测,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选择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为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为我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提供科学的依据,也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创造有利条件,这无疑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研究和外交活动的极为重

要的任务。为此，就必须大力培养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以及具备国际知识、国际战略意识和世界眼光的全面人才，其中包括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从事国际政治学科教学的教师，也包括外交外事等实际工作部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培养人才，离不开教材。培养 21 世纪的优秀人才，就需要面向 21 世纪的高水平教材。“21 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精心组织编写的。尽管这套教材的主要对象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但对一切希望系统学习和研究国际问题的读者来说，它又是熟悉和了解国际知识的理想读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最早成立、最有影响和最具规模的国际问题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1964 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一起将政治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2000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国际关系学院。长期以来，它为我国的外交、外事部门，以及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传媒单位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它在教育、科研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成了大量的科研成果，造就了众多的一流专家学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不同层次的课程体系。先后开设了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外交、外交学、国际战略学、世界社会主义、世界民族与宗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能源战略研究、国际安全研究，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等国别和区域政治经济的课程。这套教材既是对以往多年来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是近年来最新科研成果的归纳和反映，具有系统的理论性、强烈的现实性和前瞻的学术性。它既是规范、实用、好教、好学的理想教材，又是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其中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等。各书的作者主要是我们学院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同时，我们也聘请了一些校内外的著名专家担任顾问，以保证系列教材的学术质量和权威性。

在教材的编写中，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注意借鉴国内外优秀科研成果，反映最新学术观点，使用最新科研资料，力争达到高水平、高质量。这套教材陆续出版后，深受国际政治学科和相关教学、研究单位专家、学者和广大师生的欢迎。由于它的学术性、理论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用性，被不少高校所使用，成为国内使用率最高、发行量最大和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其中不少优秀教材被评为北京市的精品教材，被列入“十五”国家规划教材。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教材中有些内容需要调整；随着大批新

的学术成果的问世，有不少教材中需要补充新观点；同时教材在使用中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经编委会研究，与出版社协商，决定在继续推出新教材的同时，将对已出版的教材进行修订、再版。编委会及顾问进行了必要地调整。此外，我们还准备邀请更多的校外一流专家编写新教材。我们将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把一套学术水平更高、理论更系统、体系更科学、实用性更强的系列教材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我们也衷心地感谢关心、支持和使用这套教材的兄弟单位以及广大读者，希望对这套教材多提宝贵意见。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1)
第一节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1)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1)
历史理解的局限性与巨大潜能	(5)
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性	(8)
理论化的基本种类和形式	(11)
重视和善于从事当代史研究	(13)
第二节 历史方法的价值与“科学方法”的弊端	(15)
第三节 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19)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对历史的理解	(19)
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性思考	(21)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独特的重大价值	(25)
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	(28)
第四节 国际关系史学根本方法与国际关系史料	(32)
利奥波德·冯·兰克与现代历史学根本方法	(32)
国际关系史料基本分类和主要类别史料例解(上)	(35)

国际关系史料基本分类和主要类别史料例解（下）	（45）
第二章 现代国际权势斗争与现代国际体系演变	
（16 世纪初至 19 世纪初）	（52）
第一节 19 世纪以前现代国际体系史的理解范式和根本主题	（52）
路德维希·德约：《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	
欧洲权势斗争》	（52）
兰克对德约：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	
欧陆眼界与全球眼界	（54）
第二节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59）
现代国际体系的一种变动模式	（59）
中世纪国际秩序	（60）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上）	（63）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下）	（67）
第三节 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图谋与其失败	（71）
查理五世的称霸图谋与其失败	（71）
腓力二世的称霸图谋与其失败	（75）
第四节 路易十四法国优势的起落和英国世界性权势的凸现	（81）
从西班牙骤然衰落到法国开始勃兴期间的欧洲国际体系	（81）
路易十四的显赫优势和霸权目标	（86）
路易十四称霸图谋的反复失败和英国世界性权势的勃然兴起	（91）
第五节 列强体系的巨大扩展与拿破仑帝国的兴亡	（97）
已有的、新兴的和未来的“洲级大国”：英国、	
俄国和美国（上）	（97）
已有的、新兴的和未来的“洲级大国”：英国、	
俄国和美国（下）；普鲁士的崛起	（101）
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和国际政治的变更	（109）
导致拿破仑帝国败亡的国际政治机理	（111）
拿破仑战争的根本地缘政治结果和国际力量格局结果	（118）
第三章 19 世纪孕育的 20 世纪基本趋势	（121）
第一节 国际体系基本环境的变更	（121）
两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世界政治影响	（121）
跨国价值取向的变迁和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萌发	（123）
第二节 欧洲国际体系的急剧扩展和全球国际体系的真正出现	（125）

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展及其在 19 世纪的急剧加速	(125)
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和现代帝国主义思想	(129)
非欧现代区域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全球国际体系的真正出现	(135)
第三节 国际权势结构的变更趋势	(140)
英俄两国的显赫优势和多极格局的近乎倾覆	(140)
三大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	(144)
传统强国的显著衰落	(148)
第四节 现代大众政治的国际政治效应的萌发	(152)
旧政治下的旧外交与现代大众政治的出现和流行	(152)
初生的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对国家对外政策的作用	(154)
初生的大众政治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泛滥	(156)
第五节 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其世界政治影响	(157)
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在两个世纪里的基本停滞	(157)
战争规模的突飞猛进	(159)
战争技术的突飞猛进	(160)
海军武器的革新与世纪之交的军备竞赛	(163)
民族主义和工业化时代总体战的出现及其国际政治含义	(165)
第四章 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	(168)
第一节 引言：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	(168)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洲的衰颓	(171)
两大军事同盟体系的形成	(171)
欧洲的外交堕落和政治病态与两极对抗的急剧升级	(17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极严重后果	(18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权势的兴盛	(184)
第三节 二十年危机：英法的虚脱	(191)
国际联盟的虚幻	(191)
英法歧异与法国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	(193)
英德协调和英国半面包容的祸患	(196)
纳粹挑战面前法国的瘫痪和英国的绥靖	(199)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优势的确立	(20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欧优势的确立	(20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东亚太平洋优势的确立	(208)
第五节 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	(211)

国力极端羸弱情况下的苏俄对外政策	(211)
斯大林与苏联国力的剧增	(215)
苏联的内在虚弱和斯大林的外交	(2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苏联权势的兴盛	(219)
全球国际体系的新构成	(222)
第五章 超级强国的对抗和竞争	(225)
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	(225)
美苏关系史的基本性质与冷战的特质和历程	(225)
冷战起源的历史说明	(227)
冷战起源的理论说明	(230)
第二节 冷战对抗的历程	(232)
美苏冷战格局的完全形成	(232)
冷战的最高潮	(239)
冷战最高潮过后的两大对抗浪峰	(240)
冷战期间的缓和或局部缓和	(242)
第三节 冷战对抗的基本特征	(243)
冷战对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含义	(243)
冷战对抗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245)
美苏军备竞赛	(247)
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	(251)
第四节 冷战的全球化：美苏在欧洲以外的全球性竞争	(253)
当地力量、全球战略和全球性竞争	(253)
美苏与东亚的革命和拉美的变更	(255)
在中近东和非洲的美苏竞争	(257)
第五节 苏联的危机和瓦解与冷战的终结	(259)
冷战与苏联的危机	(259)
戈尔巴乔夫的对策与苏联的瓦解	(261)
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262)
第六章 超级强国以外的主要新力量	(264)
第一节 引言：新兴强国与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	(264)
新兴强国的选择与命运	(264)
造反和学习：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民族主义	(266)
第二节 欧洲强国抑或世界强国：德国的选择和命运	(268)

德国历史和民族道路的特殊性	(268)
第二帝国的世界强国追求	(269)
纳粹暴政的根源与希特勒的国际政治观	(271)
希特勒的世界强国追求	(274)
第三节 和平扩张、帝国征服、商业福利：日本的选择和命运	(277)
和平扩张抑或帝国征服：日本的军事帝国主义选择	(277)
20年代：军事帝国主义的暂时落潮	(280)
军事帝国主义的再度勃兴及其覆亡	(282)
当前日本的国家方向选择问题	(284)
第四节 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的选择与命运	(285)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的基本历史轨迹	(285)
国际社会中的中国——趋同倾向与造反倾向	(287)
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	(291)
第五节 亚非现代民族主义的萌发和兴起	(292)
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三个典型阶段	(292)
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和兴起	(293)
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和兴起的基本原因	(295)
第六节 民族运动的飞跃与西方统治的瓦解	(297)
民族运动的飞跃与西方列强的对策	(297)
西方统治的急剧瓦解及其基本原因	(300)
越南抗美战争	(303)
第七节 第三世界运动的兴衰与超越民族主义的必要	(305)
第三世界运动的萌发和兴盛	(305)
第三世界运动的落潮与超越民族主义的必要	(308)
第七章 大众政治、新技术和新国际规范	(312)
第一节 引言：世界政治中的另三大动态	(312)
大众政治与国际政治变迁	(312)
新技术与国际政治变迁	(313)
新力量塑造的新国际规范	(314)
第二节 大众政治与国际政治变迁	(315)
大众政治与“外交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西方民主国家	(315)
大众政治与“外交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纳粹极权国家	(319)
大众政治与“外交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	(321)

大众政治与国际宣传和国际颠覆	(323)
第三节 新技术与国际政治变迁	(325)
“指令性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及其重大意义	(325)
核武器与世界政治	(326)
防止核武器扩散	(331)
信息技术革命与世界政治	(332)
大众政治与新技术的结合——20 世纪的总体战	(336)
第四节 新力量塑造的新国际规范	(339)
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	(339)
20 世纪以前现代国际规范体系的演变	(342)
世界政治中的新力量与国际规范体系的巨变	(345)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巨变	(347)
当代国际权利和义务的载体认定与人权国际规范	(350)
当代国际规范的根本来源和根本特征	(355)
当代国际规范体系的主体新内容（上）	(356)
当代国际规范体系的主体新内容（下）	(359)
第八章 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政治	(364)
第一节 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	(364)
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变更与稳定	(364)
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	(368)
世界广大欠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	(370)
第二节 时代特征和中国崛起	(372)
时代特征：世界基本格局与基本潮流	(372)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和必要条件	(375)

第一章

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重点问题

- 历史研究的三类基本目的；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和思考方式
- 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定义；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性或重大功能
- “科学方法”的不足和弊端；历史方法的价值和真谛
-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对历史的理解
- 现代历史学的根本方法
- 国际关系史料的六大类别；它们的重要性和不同特征

第一节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历史研究有三类基本目的，或者说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

识兴趣”，三是“人类自我认识”。

经世致用是一般的人们甚至是许许多多历史学家谈论得最多的历史研究目的。然而只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下述两种大不相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一种是简单化类比的、机械的甚而庸俗的，既非真正精当地辨识和探究往昔的事态与其确实的形成原因，也不足够具体地考察和分析现今的实际情况与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现今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达到或接近达到历史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那是被现代历史学的首要开创者利奥波德·冯·兰克当做根本的历史哲理强调的^①。亦即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合理的怀疑和开放的思维，在认识中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具体地认识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

在前一种经世致用的史学当中，除去那些见于史籍的“御用史学”、“幕僚史学”和“道德说教史学”之类特别低劣的形态之外，还有着颇受尊敬甚而在一段或长或短的现代历史时期里被许多人衷心推崇乃至顶礼膜拜的权威形态，那就是随意地调度或拨弄史料和史例，以便发现、论证和例解所谓“科学的铁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流行声誉和实际影响都显著超过克劳塞维茨的19世纪军事史家约米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其笔下，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居然失去了它们与旧制度之下“七年战争”的巨大的实质性区别，而对所有这些战争进行研究的动机和结果，是搞出他宣称的寥寥几条“不变的战略科学原则”，以便用于无论何种战争。^②在马汉的海权史当中，对史料和史例的拨弄导致了对某些重大历史事实和机理的扭曲与误解，例如极严重地夸大制海权对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的意义；这种拨弄甚至还被马汉本人当做基本的研究方法向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公开倡导。^③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位相信“科学铁律”的经世致用者有着一项压倒一切的目的，那就是要将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教给他同代和后代的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同这些人相反，修

^① 参见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与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第15章，伦敦，1957；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载《欧洲》，1998（4），4~10页。

^② 参见约翰·夏伊：《约米尼》，见彼得·帕瑞特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John Shy, “Jomini”,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143~185页，普林斯顿，1986。该书在后文出现时简称《现代战略的缔造者》。

^③ 参见菲利普·克洛尔：《马汉：海军史家》（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见帕瑞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449~455页。

昔底德那样的伟大史家（即使并非没有某些可疑的先入之见和偏颇信念）从对于历史的严肃认真的探究、思考和总结中，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博大精深的观察和论述，他尽可能体会和提炼国际政治的本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内体制和国民精神对于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政治领导的素质、帝国主义的动因和行为特征、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含义、国家战略的要素及其成败原因等。^①而且，他展示出来的政治机理是那么丰富，那么“非规律化”，以至于当今西方一位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多伊尔盛赞其“复杂的现实主义”，认为它实际上优于此后近2500年里西方所有主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流派。^②还有兰克，这位大历史学家兼国际关系思想家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中，就国际关系史而言划时代地提出了一大基本模式和一大基本趋势：先前两百多年里欧洲国际体系内权势格局反复变更的模式及民族主义兴起和现代民族国家广泛生成的趋势。正是在这总结历史、启示未来的雄文的结尾部分，他极有力地强调了上述与简单化比拟和机械性类推截然相反的哲理——绝对的个性与相对的共性两者的有机统一。^③

“智识兴趣”（intellectual pleasure）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虽然这一点并非庸俗唯物主义者或自我中心主义者（不管这“自我”是指本人、本集团或本阶层，还是指本民族、本国甚或本文明）所愿接受或承认的，但却是一项不说自明的常识。正如利益考虑虽然极为常见并且通常至关重要，却不能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基本原因那样，经世致用决不能囊括历史研究的所有基本目的或动力。大致而言，这里所说的智识兴趣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本位的和狭隘的，甚至是猎奇性的，有时特别流行的一些“英雄史学”、“阴谋史学”或“轶事史学”等，便是其中较低劣的例子。另一类智识兴趣则大为不同，它以严肃认真地认知事态本身的内在机理特别是那些与经久流行的俗见相违的内在机

① 例如见杰奎琳·德洛米莉：《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牛津，1963；格雷戈里·克兰：《修昔底德与古代朴素：政治现实主义的局限》（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98；本杰明·弗兰克尔编：《现实主义的根源》（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第2~4章，伦敦，1996；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见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26~5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② 参见迈克尔·多伊尔：《战争与和平之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第1章，纽约，1997。

③ 参见《论列强》，见利奥波德·冯·兰克著，格奥尔格·伊格尔和康拉德·冯·毛奇合编：《历史的理论与实践》（“The Great Powers”，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65~101页，印第安纳波利斯，1973；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载《欧洲》，1998（4），7~10页。

理为主要目的，还要加上对历史包含的丰富生动的真实悲剧、真实喜剧或真实讽刺剧的“鉴赏”。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当然有（甚至需要有）价值取向和设身处地的情感移入，而且事实上也大都属于或倾向于本集团、本阶层、本民族、本国甚至本文明的好恶和利益关切。但尽管如此，有如站在“外星人”立场的那种超脱——或许可以说站在宏观历史和人类本身的高度上的那种超局部、超时代意识——至少有时是需要的和可贵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离不开这种超脱，司马迁的《史记》应当说也多少是如此。取小者而言之，当代美国的德国史泰斗和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戈登·克雷格发表过一篇文章——《论阅读外交文书的乐趣》，可略为夸张地说是大师级史学家才能写出的、潇洒深切地表达智识兴趣的佳作。^① 这样的智识兴趣并未妨碍（实际上还促进了）他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抨击。要达到很高层次的“超脱”，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斯多葛精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虽然具有极明确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却勇敢和坚决地揭示了势将导致本阶级衰落的一个经济法则——利润率倾向下降，从而被马克思誉为“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②。历史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最高主题，或许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一语来表述。这里的“天”可理解为客观必然性，“人”可以理解为主观选择和偶然性。这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哲学中的必然与自由（命运与自由）的关系，或曰历史的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第三类基本目的是人类自我认识。这指的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对自身的往昔和未来的意识和认识，或者用古罗马大哲学家西塞罗的话说，是指这样的人“领悟后果之链，设想事态原因，理解因果关系，抽引类比，并且将现今与未来联系和联结起来，从而容易概览他的整个生活历程，做出他的所作所为所需要的准备”。正如西塞罗强调，人与动物的最显著区别就在于此。^③ 人作为群体与作为个人的基本区别之一也在于此。现代史上，有两种探求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历史主义于19世纪兴起以前，人们主要是像启蒙学

^① 参见 Gordon A. Craig, "On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载《当代史季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第26卷第3~4期, 1991年9月, 369~384页。

^② 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II），126页，1973。关于资产阶级利润率下降参见《资本论》，1版，第3卷，第三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尤其见其中第287、310页。

^③ 引自莱斯利·沃尔克尔为马基雅维利《论李维》所作导言 (Leslie J. Walker, Introduction to Machiavelli's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 91~92页，伦敦，1950。

派那样（当然也像自然法信仰者与古典现实主义者那样）规定人——说到底多半是个人——的本性，即被规定为本善或本恶的人性，严格地说是先验的人性。历史主义兴起后，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转而以历史进化、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人的群体的演化。这是人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伟大的变化。

上述意义上的人类自我认识很难说是一种自觉地旨在经世致用的努力，也不同于旨在智识兴趣的那种局外和超然的观察，尽管它会因为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对历史的实际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需要相当程度的超然和必不可少的纯思索兴趣。它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一种自省，而在这类自省的人中，历史学家充当着主要代表。在现当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及其种种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效应自19世纪中期往后在全世界广泛扩散以来，探究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演化大致意味着三件事情，或者说包含着三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面：（1）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这在全球性国际和跨国交往急剧增进的晚近半个世纪和未来岁月里尤其重要；（2）对于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人类基本群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个性的具体和深切的理解，其中包括对于此等群体的自我认识的理解，因为这种自我认识构成其历史个性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和塑造力量；（3）对于“智识兴趣”范畴内丰富多彩的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连同对于这些要素与必然性即历史深层的大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追索（这种追索要不致过度自信和缺乏自我怀疑精神），就必须明白它们永远无法被解释得“水清见底”。例如我们要理解20世纪世界史上最大的事态之一——苏联的瓦解，就需要有上述所有三个基本方面，而就目前的理解水平而言，尤其需要的是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①

历史理解的局限性与巨大潜能

历史理解的局限性与巨大潜能的问题，换一句话说便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思考对于现今的适宜性的问题。就此，可以引用当代英语世界内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头号权威彼得·帕瑞特的一席话，这段话取自他为自己主编的非常著名的论文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而撰写的导言：

爱德华·米德·厄尔（美国最有名的战略思想家之一，写作年代主要

^① 参见在这方面一项比较杰出的思考，丹尼尔·德内和约翰·伊肯伯里：《苏联变更的国际根源》（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载《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6卷第3期，1991~1992年冬季。